

晚清西學彙編資料與知識分科

章 清（復旦大學歷史系）

現代學科的建立，其基本標誌之一是知識分科觀念的形成。如論者闡明的，科學的進展不是同時取得的，而是不同時期取得的。“帶頭的是天文學，繼而是十六世紀的物理學，化學在十八世紀得到發展。儘管維薩留斯（1543年）和哈威已帶了頭，但生物學仍落在後面，直到十九世紀才取得進展。”¹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還揭示了，19世紀後半葉主要有三種方法促成了學科的制度化：大學以學科名稱設立學系（或至少設立教授職位），成立國家學者機構（後來更成立國際學者機構），圖書館亦開始以學科作為書籍分類系統。以此對照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學科，就會發現，這些學科不少在19世紀以前是沒有的，約在19世紀後半葉，這些學科才完成制度化的建制。²中國現代學科的成長也經歷這樣的歷程。稍前筆者已撰文說明，立足於中國視野對此加以審視，尚有更多需要考量的地方。原因在於，中西學術交流涉及的是兩種“文明”的對話，各自分別扮演著“傳播者”與“接引者”的角色。問題包含兩個方面：其一是西方分科觀念是如何傳入的；其二是中國本土是如何接引的。對這些環節略作梳理，便可發現，接受西方分科觀念只是問題之一面，什麼因素主導著中國對西方知識的接引，卻是值得重視的另一面。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作為“傳播者”，在“援西入中”的過程中，其身份已決定了所謂“援西”是有高度選擇性的，基於策略性的考慮，不免迎合本土的知識架構；“接引者”呢，也往往將外來知識納入其所熟悉的知識架構，尤其致力於發現西學之“關鍵”。因為篇幅限制，此文只是圍繞晚清所確立的“采西學”之方針，略加辨析，主要關注晚清對各學科次第的探討（後集中辨析“西學門徑”），以期說明晚清所形成的對西方學科知識的理解，受多重因素的主導。³該文算得上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展開，主要檢討晚清出現的西學彙編資料對於認知知識分科具有的意義。對此，有必要首先說明守護“歷史的維度”的意義。

所謂“歷史的維度”，無非是強調“證釋古事者”，當注意其“時代限制”。⁴魯迅在20世紀初年即提出，欲以今知古，須“自設為古之一人，返其舊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與之批評，則所論始云不妄。”⁵陳寅恪詮釋“瞭解之同情”的治史取向，對此也有所論

1 亞·沃爾夫著：《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周昌宗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上冊，第1，10頁。

2 華勒斯坦等：《學科·知識·權力》，劉健芝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213-26頁。

3 章清《“采西學”：學科次第之論辯及其意義——略論晚清對“西學門徑”的探討》，《歷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7頁。

5 魯迅：《科學史教篇》，《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集，第26頁。

述：“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故此，“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所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這段常被徵引的話，自有其深意在，涉及的乃縱橫古今的歷史學的自處之道；不過，這樣的看法算不上“新見”，涉及古今的論述歷代都不乏持相似見解者。⁶ 以此而言，審視中國現代學科的形成，似也大可不必強調要恪守“歷史的維度”；所謂“學科”，本是特定歷史時空的形式；無論中西，都是伴隨“現代性”論述的展開而逐步成形。然而，追溯問題的緣起，卻不難看出提出“歷史的維度”有其必要性。不啻唯是，中國現代學科成長於“援西入中”的背景，這更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

陳寅恪對“瞭解之同情”治史立場的詮釋，體現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審查報告”，正關乎哲學作為現代學科在中國莫立所經歷的曲折。陳所強調的是，“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然而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換言之，“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在陳看來，這樣的哲學史，“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⁷有意思的是，同樣是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審查報告，金岳霖則批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乃“根據於一種哲學的主張而寫出來的”，“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頗多牽強附會之“成見”，而且書中所流露的成見“是多數美國人的成見”。⁸

如再結合王國維及傅斯年的論述，則更可發現在中國背景下檢討學科的形成所面臨的難題。1904年1月頒佈的《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算得上劃時代的文獻，對中國現代學科的莫立影響深遠。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由中央政府頒佈且由政府督導施行的全國性法定學制系統，較之1902年頒佈的《欽定學堂章程》，改動的主要是大學堂設科方面的調整。除將大學院改為通儒院外，大學也改為八科：經學科、政法科、文學科、醫科、農科、工科和商科。對此，王國維就提出此根本之誤在獨缺“哲學”一科，之所以不列此科，則是“以哲學為無用之學”。王明確表示，“余輩之研究哲學者，亦必昌言此學為無用之學也。何則？以功用論哲學，則哲學之價值失。哲學之所以有價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範圍故也。”而且，“今若以功用為學問之標準，則經學、文學等之無用，亦與哲學等，必當在廢斥之列。而大學之所授者，非限於物質的應用的科學，不可坐令國家最高之學府，與工廠閭閻等。此必非國家振興學術之意也。”⁹王國維頗為捍衛“哲學”作為“無用之學”的地位，與之適成對照的是，在給胡

6 對此詳細的分析可參見羅志田《陳寅恪史料解讀與學術表述臆解》，收其所著《近代中國史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75-200頁。

7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見《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79-81頁。

8 金岳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下冊，“附錄”。

9 王國維：《靜安文集續編·奏定經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王國維遺書》第3冊，上海：

適的一通信函中，傅斯年則明確道出古代中國嚴格說來“沒有哲學”而只有“方術”，他甚至堅持捨棄“哲學”一詞不用，而只用歷史性的“方術”一詞，“用這個名詞，因為這個名詞是當時有的，不是洋貨”，乃“他們自己稱自己的名詞”，反之，如“把後一時期，或別個民族的名詞及方式來解他，不是割理，便是添加”。¹⁰在胡適的學術生涯中，也曾發生頗有意味的轉變，以《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在中國學術舞臺獲得證明的胡適，此後卻轉向對“中國思想史”的清理，《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下）也始終未曾出版。¹¹胡適、傅斯年在現代中國學界都是居於“中心地位”的人物，他們對“哲學”的認知，多少也影響到哲學在中國的發展，中央研究院就沒有為“哲學”留下空間。直至今日，國際學界圍繞有無“中國哲學”，仍在發生激烈的爭辯。¹²

圍繞“哲學”一科所發生的爭辯不是這裡可以檢討的，但上述見解，卻點出了在中國背景下思考現代學科的形成往往守護於不同的“立場”：歷史與當下，中國與西方，構成了審視相關問題的樞機所在，實有必要對此加以分析。

近年來，圍繞晚清所出版的大量西學彙編資料，檢討知識分科觀念的形成，已催生出大量的研究。然而，這些資料該如何利用，還存在不小的分歧，別的且不論，這些資料該如何“命名”，已是言人人殊。¹³這裡無意捲入其中的爭論，只是試圖說明，基於知識分科審視中國現代學科的形成，有必要恪守“歷史的維度”，如此才能把握變遷之軌跡。利用晚清出版的西學彙編資料，更是如此。有道是“要把金針度於人”，晚清出現的多種西學彙編資料，可視作探索“西學門徑”的結果。實際上，對晚清“西學東漸”歷史圖景的把握，主要也依託這些資料展開；立足這些資料，或更易辨析守護“歷史的維度”對於審視中國現代學科的形成所具有的意義。同時，也可為相關問題的展開確立更好的起點。吳虞曾言及學佛的體會：“講佛學者，於當看之書，言人人殊，故余先看《高僧傳》，觀自來高僧所重何經，即依之以次購讀，庶不至搖惑無主。求門徑于時人，不如求門徑于古人也。”¹⁴所謂“歷史的緯度”，體現的正是同樣的精神，而“求門徑于古人”，當能發現問題的關鍵所在。

一、知識分科與“西學東漸”歷史圖景的塑造

論者總結“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曾提出“未來的學者們需要探

上海書店，1983年，第641-54頁。

10 傅斯年：《致胡適》，1926年8月18日，收入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第37冊，第357頁。

11 這方面詳細的討論，參見章清《胡適評傳》，南昌：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

12 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51, No. 3, Eighth 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 (Jul., 2001), pp. 393-413。中國方面對此的回應可參見葛兆光《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關於中國哲學和儒教定義的爭論》，《開放時代》，2001年第11期。

13 新近的研究是將這些資料作為“百科全書”加以利用。相關的討論參見陳平原、米列娜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14 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吳虞日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上冊，第237頁。

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向研究中西思想交往的學者提出的，傳教士傳佈的內容清晰到什麼程度？傳教士編纂的東西能看懂到什麼程度？而且它們在多大程度上表達了編輯者想要通過它們來說明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向思想史學家提出來的，即傳教士傳佈的內容究為何物？第三個問題是，誰接受了傳教士傳佈的內容？傳教士譯著的讀者範圍，在社會上和地域上究竟有多大？讀者的類型在那些年間是怎樣發生變化的？“只有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我們才能較準確地估量傳教士的非宗教性著作所產生的影響的程度和性質。”¹⁵無疑的，上述問題對於認知“西學東漸”來說乃最基本的問題，也是研究者渴望回答的問題，而此前的研究也多在這一層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學科”如何“建構”起“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歷史是如何“建構”的，成為不得不關心的首要問題。而且，如果說現代學科的建立，其基本標誌之一是分科觀念的形成，與之適成對照的是，分科也成為勾畫“西學東漸”歷史圖景的樞機所在。而且，較早前的勾畫，並沒有通過分科觀念來進行，愈到後來，分科觀念呈現的“西學東漸”歷程愈發清晰。

張星烺《歐化東漸史》1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初版，是較早涉及這段歷史的專著。該書按照“有形部”（或“物質文明部”）與“無形部”（或“思想文明部”）勾畫歐化的歷史，前者如“天文、曆法、醫藥、測繪、機器、輪船、鐵路、電報是也”；後者如“宗教、哲學、倫理、政治、文學等等是也”。很顯然，以這樣的方式勾畫“歐化東漸”的歷史，還是初步的，儘管書中也試圖按照學科的分類梳理“歐化”的具體情形，但所做分科並不嚴格，甚至完全沒有提及各類書籍究竟出版了多少種。譬如，書中提及江南製造局所譯西書，也只是籠統表示，“所有算學、化學、生物、物理、地理、音樂、身理、衛生、哲學、神學、教育、法律等學，皆有譯本。”¹⁶柳詒征《中國文化史》創稿於1919年，1931年、1947年、1988年曾多次重版。該書第三編近世文化史第四章“西方學術的輸入”，開篇即寫道：“利瑪竇等之來也，一以傳西方之宗教，一以傳西方之學術。既貢地志、時鐘，兼自述其制器觀象之能，明其不徒恃傳教為生也。”內中還指出，“明季西教士攜至中國書籍至多，所譯述亦至夥。”但具體譯書的情況，也未見說明。書中錄有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中的“明末清初在中國之耶穌會士及著書一覽表”，（注明原表有遺漏及失誤處，今為增改。）對這些譯述也沒有進行知識上的分類。本編第十四章為“譯書與遊學”，已涉及晚清之“西學東漸”，但也沒有具體說明譯書的情況，只是引證了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對西學“學”、“政”、“教”的分類。¹⁷

除此而外，針對明清間耶穌會士的譯著，也不乏論著進行分類說明。徐宗澤編著的《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在該書“凡例”部分，就首先闡明“是書悉模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法，分為聖書、真教辯護、神哲學、教史、曆算、科學、格言等七類”。卷

15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上冊，第625-26頁。

16 張星烺：《歐化東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4，39頁。該版據1948年版略加修訂。

17 柳詒征：《中國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53-76頁。

一“緒言”還專有一節論述“西士所著書之分類”，認為，“西士遺留於吾人之書籍，大綱可分為宗教及科學兩類，其細目亦可分析言之”，具體是：“宗教書中有論道理及講修成之書，有辯護、辟迷、釋難、解惑之書，有聖人行實，及聖教經文等書。科學書中，有天算、地輿、水學、哲理、小學、形下學等等。”在別的地方，論及“明末耶穌會士輸入之科學”又指出，“輸入之科學，有天文、曆算、地輿、砲銃、水利及格物致知之學”。兩相對照，不難看出所使用的分科名稱多少有些隨意性，也並不嚴格。作為補遺之“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書名表”，也未采分類之方式，而是“以出版之時期為次”。¹⁸大致說來，對於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的著述情況，相當一段時間還停留在這樣的看法上——“半為發明教義，半為介紹科學”。錢存訓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和裴化行《歐洲著作漢譯書目》兩書，就統計出耶穌會士中譯西書，主要由“教義”與“科學”兩部分構成，“其旨以盡性至命為歸，其功則本於窮理格致”。¹⁹

值得注意的是，伴隨研究的深入，晚清“西學東漸”的圖景逐步清晰化，往往按照當下的分科觀念總結晚清西書中譯的情況。上引錢存訓文章，就對1850-1899年間所譯西書進行了統計分析，指出總計所出版的567種書中，哲學10種（1.8%）、宗教5種（1.0%）、文學3種（0.5%）、藝術2種（0.3%）、史地57（10.0%）、社會科學46種（8.1%）、自然科學169種（29.8%）、應用科學230種（40.6%）、雜錄45種（7.9%），其資料主要依據徐維則的《東西學書錄》、顧光燮《譯書經眼錄》等西學目錄書。²⁰而熊月之的研究，更具體指出，從1811年馬禮遜在中國出版第一本中文西書，到1911年清朝統治結束，首尾100年，中國共翻譯、出版西學書籍2291種。還將此一過程區分為四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1811-1842年，馬禮遜等傳教士共出版中文書籍和刊物138種，屬於介紹世界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方面知識的，有32種。第二階段，1843-1860年，香港及上海、寧波、福州、廣州、廈門等六個城市共出版西書434種，其中純屬宗教宣傳品的有329種，占75.8%；屬於天文、地理、數學、醫學、歷史、經濟等方面的有105種，占24.2%。第三階段，1860-1900年，共出各種西書555種，其中哲學社會科學123種，內含哲學、歷史、法學、文學、教育等，占22%；自然科學162種，含算學、重學、電學、化學、光學、種植物學等，占總數29%；應用科學225種，含工藝、礦務、船政等，占總數41%；其他45種，包括遊記、雜著、議論等，占總數8%。第四階段，1900-1911年，中國通過日文、英文、法文共譯各種西書至少有1599種，占晚清100年譯書總數的69.8%，超過此前90年中國譯書總數的兩倍。其中從1900至1904年5年，譯書899種，比以往90年譯書還多。尤其突出的是社會科學比重加重，以1902年到1904年為例，三年共譯文學、歷史、哲學、經濟、法學等社會科學書籍327種，占總數61%。同期翻譯

18 徐宗澤編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凡例”，第1頁；第1-2，473-78頁。

19 參見錢存訓：《近世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文獻》1986年第2期；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8頁；Tsuen-hsuei Tsien,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s”,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3, no.3, pp.305-328.

20 錢存訓：《近世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文獻》1986年第2期。

自然科學112種，應用科學56種，分別占總數21%、11%。²¹

對於中譯日文書的統計，也是如此。前揭錢存訓文，統計出1900年前的中譯日文書共86種，1902-1902年間則高達321種，占這一時期翻譯總數的60%。在321種日文中譯書中，哲學21種，宗教2種，文學4種，史地90種，社會科學83種，自然科學73種，應用科學24種，雜錄24種。而譚汝謙的統計是，1868-1895年中譯日文書總共只有11種，而從1896-1911年的15年間，共達988種，其中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類僅占172種，哲學、社會科學及中外歷史三者合計達636種，而又以社會科學為最多，有366種，其中包括政治、經濟、教育、法律等。²²

用不著列舉更多的研究，對於“西學東漸”的認知，大體均由此展開，主要援據西方分科觀念勾畫晚清“西學東漸”的歷程。換言之，在歷史與當下及中國與西方之間，所選擇的是“當下”與“西方”。而由此所把握的歷史進程，也自有其必要性，可以清楚看出現代中國各學科成長的脈絡。譬如，要追溯“政治學”學科的形成，自然會談到《萬國公法》一書，儘管“政學”或“政治學”的名稱要稍晚才出現；同樣的，審視“經濟學”學科在中國的成長，也要考察《列國歲計政要》等論著的意義，那時也還沒有“經濟學”的名稱。而在此前的西學彙編資料或目錄書中，《萬國公法》與《列國歲計政要》等書，都被歸到“史學”或“史志”之類（詳後）。

然而，這樣針對中譯西書的統計分析，卻也不無可議之處。基於西方分科觀念與當下學科認知所展開的對“西學東漸”歷史進程的分析，往往導致了對歷史的“遮蔽”，似乎所分析的物件早已有清晰的分科觀念。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所譯西書是常被徵引的例證。論者往往得出這樣的結論，該館所譯西書包括：史志6種，政治3種，交涉7種，兵制12種，船政6種，學務2種，工程4種，農學9種，礦學10種，工藝18種，商學3種，格致3種，算學7種，電學4種，化學8種，聲學1種，光學1種，天學2種，地學3種，醫學11種，圖學7種，補遺2種，附刻10種，總計160種。這不免讓人產生這樣的影響，上述分科觀念已主導了翻譯館的工作，研究者甚至還據此來評價翻譯館的成績。對此就有必要指出，上述數字所依據的陳洙輯《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出版於1909年，因此所反映的分科觀念已是成書年代的了。²³當初江南製造局出版這些書籍出版，未必已有這樣的分科意識，並以此來規劃西書的翻譯。

如果比照傅蘭雅《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就不難瞭解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的“歷史圖景”是如何建構的。該文對翻譯館的譯述工作按“各門之學”列表如下：²⁴

21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15頁。

22 譚汝謙：《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1980年。

23 陳洙輯：《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江南製造局，1909年刊本。

24 傅蘭雅：《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格致彙編》第3年第5卷，1880年。

各門等書	已刊成者	尚未刊者	未譯全者	已譯出者
算學測量等書	22部（計52本）	2部（計8本）	3部	計5本
汽機等書	7部（計17本）	3部（計6本）	1部	計2本
化學等書	5部（計19本）	1部（計1本）	1部	計4本
地理等書	8部（計12本）		2部	計9本
地學等書	5部（計20本）			
天文行船等書	9部（計27本）	3部（計4本）		
博物學等書	6部（計14本）	4部（計5本）	1部	計1本
醫學等書	2部（計8本）	1部（計6本）	2部	
工藝等書	13部（計15本）	9部（計26本）		
水陸兵法等書	15部（計41本）	9部（計26本）	2部	計2本
年代表新聞紙等	6部（計10本）	1部（計1本）		
造船等書		3部（計13本）	1部	計1本
國史等書		5部（計18本）		
交涉公法等書		2部（計26本）		
零件等書		2部（計2本）		

傅蘭雅此文撰寫於1880年，與1909年出版的陳洙輯《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稍作對照，就不難看出學科意識的提升，如何影響到對歷史的把握方向。然而，江南製造局開辦之初，未必已有明確的分科觀念。首先是翻譯館之設，是因為認識到，“翻譯一事，系製造局之根本。洋人制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扞格不通，故雖曰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制器之所以然。”²⁵在這樣的思想主導下，所選擇的譯書也基於“急用”，李鴻章即上奏：“最要為算學、化學、汽機、火藥、炮法等編，因屬關係製造；即如行船、防海、練軍、採煤、開礦之類，亦皆有裨實用。”²⁶

因此，基於當下對學科的認知勾畫“西學東漸”的歷史圖景，其意義自不待言。譬如，王揚宗根據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不同時期編輯的目錄整理出一份較為完整的書目，對於瞭解該館翻譯工作，就大有助益；²⁷熊月之在前人的基礎上整理出1811-1911年較為完備的譯書清單，對於把握晚清“西學東漸”的歷史，也是極為重要的資料。然而這一圖景的塑造可能導致的對於認知歷史可能產生的“遮蔽”，卻也當引起足夠的重視。是否如陳寅恪所指明的“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還不好說，但圖景之清晰影響到對這一過程的“歷史性”認知，卻是肯定的。其帶來的直接後果便是在於在這些數位化的描繪中，給出的直接暗示是有清晰的學科定位，但這恰是最值得

25 江南製造局編：《江南製造局記》，卷二，公牘，文寶書局1905年石印本。

26 光緒元年李鴻章奏，見《洋務運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四），第30頁。

27 參見王揚宗《江南製造局翻譯書目新考》，《中國科技史料》，1995年第16卷第2期。

深思的。尤其值得檢討的是，這些數位大約都依託於晚清所出版的各種西學彙編資料或各種目錄書籍展開，更需要加以檢討。這裡就有必要強調，這些目錄書籍所反映的已是成書年代的認知，而非這些書籍出版時的認知。具體地說，這樣的統計實際上是二度創造的產物，其一，主要依據的西學目錄書，所反映的學科觀念是這些書籍成書年代的認知，已非當時的認知；其二，研究者在依據這些目錄書進行統計時，又援引了當時的學科觀念對這些目錄書進行了取捨。這樣二度取捨的結果，自會影響到對檢討晚清西書中譯的“歷史性”描繪，不免產生歧義。比如，同樣針對西書中譯的總體情況進行分析，由於研究者認知的差別，就往往產生很大的區別。如錢存訓是將哲學、史地等與社會科學分別看待，熊月之在統計時則將哲學社會科學作為一類，內含哲學、歷史、法學、文學、教育等。這也提示我們需要守護“歷史的維度”對這些西書進行檢討，這樣才能回到歷史語境分析其中的得失。晚清以來所出版的各種“西學”彙編著作，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學者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統計，以此展現西學入中是在哪些環節展開。這樣的統計分析不能說有什麼不當之處，問題在於，當時的分類是在怎樣的情形下展開的，這是必須追問的。倘若做了這方面的工作，則這樣一些資料對於瞭解現代學科的形成，即是不可多得的資料，它能夠較為有效地說明，斯時是如何為這些學科定位的。如對比西學分類目錄，就不難發現，其中的分類是難以周全的，不單是大分類，很多被歸到某一門類的書籍，未必是恰當的。如不限於晚清所出版的諸多西學彙編資料的“目錄”，而是深入檢討各“目錄”下具體所收著作，就不難瞭解其中的曖昧性。

二、並非“已知”的西方背景

強調“歷史的維度”，原因並非僅僅在於晚清西學彙編資料所具有的“歷史性”屬性，關鍵還在於，分科知識作為“西學東漸”的直接後果，也同樣具有“歷史性”的屬性。因此，在正式討論晚清西學彙編資料之前，還有必要對此略加辨析。在較為寬泛的意義上，中國現代學科的建立可歸於“援西入中”的產物。但所援之“西”為何，本身即是問題。別的且不論，所謂“西學”，不僅來自於歐美，日本管道所具有的意義，也不可忽視。與“西學”名稱相應的“東學”、“新學”之名，同樣流傳於晚清，便足以說明問題的複雜性。所謂“歷史的維度”，在這個環節也呈現出特殊意義。實際上，涉及中西交流的課題，或都有必要強調並不存在“已知”的西方背景。²⁸西方“學科”形成的歷程同樣

28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善意警告過那種把西方看作“已知”這一過於自負的假設。在其看來，在西方對其紛繁的內在含義陷入令人迷惑、嘈雜喧鬧的爭論時，轉向非西方世界，西方卻儼然成了一個明確的已知量。實際情形卻是，19、20 世紀西方賢哲在把握現代西方發展的內在含義時，意見紛呈，莫衷一是：圍繞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的爭辯，也是熱鬧非凡，此長彼消。很少有人敢於斷言，18、19 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在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形成了一個輕易可被理解的綜合體。見史華慈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葉鳳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2 頁。

複雜，這是討論中國現代學科問題當有的自覺。

學科是特定歷史時空的形式，古代和中世紀的科學傳統起到哪些作用？是否對科學的進程和形態產生了持久而連續的深刻影響？抑或它只是不會產生任何結果的死胡同？西方科學史學界就有長期爭辯，並形成了著名的“連續性問題”，“中世紀主義者”（medievalists）和“早期近代主義者”（early modernists）的爭論，至今仍在延續。²⁹頗具代表性的看法是，在科學理論還沒有發展以前人們就相信科學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覺地從中世紀神學中導引出來的”。³⁰科學社會學的奠基人默頓（Robert K. Merton）也試圖揭示，“宗教就是以這種直截了當的方式贊許和認可了科學，並通過強化和傳播對科學的興趣而提高了社會對科學探索者的評價。”³¹當然也不乏“衝突論”者，將科學的起源描繪為“科學與教條主義的神學之間的鬥爭”。³²但不論如何，正如本文一開始就述及的，科學的進展不是同時取得的，而是不同時期取得的。

中國現代學科的建立，與“西學”傳播的各個階段密切相關，因此，即便討論的時段主要是晚清，也有必要上溯到明清之際，以尋求問題的起點。圍繞明清之際中西文化的撞擊，就不乏這樣的追問，耶穌會士所傳播的西學知識，是否能代表斯時的西方文化？³³在較為寬泛的意義上，不妨接受這樣的前提，明末肇端的歐洲與中國第二次互相接觸，“兩種文明的最有代表性的文人成了主角：耶穌會士和中國士大夫，前者是當時歐洲文化領域的佼佼者，後者則是傳統儒家文化培育出來的文人。”³⁴就此而言，先且不說學科的問題，單單是“援西入中”的主體——耶穌會士，已說明需要面對耶穌會傳教士諸種不同的身份。換言之，實有必要瞭解來到中國以及其他地方的傳教士是從什麼國家在什麼時間來的，像利馬竇、羅明堅等，就沒有對於某個國家的效忠。他們是意大利人，但意大利在當時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分裂為許多小國家。同樣的例證是南懷仁的身份，我們可以經常看到稱南懷仁是比利時人，但比利時在當時根本不存在，1830年比利時才成為一個民族國家。³⁵具體到學科的討論，確有必要指

29 大衛·林德伯格：《西方科學的起源》，王珺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第367-68頁。

30 懷特海著：《科學與近代世界》，何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13頁。

31 默頓著：《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範岱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08-109頁。

32 安德魯·迪克森·懷特著：《基督教世界科學與神學論戰史》，魯旭東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上冊，“導言”，第5頁。

33 李約瑟（Joseph Needham）特別指明了，即便耶穌會士把歐洲的科學和數學帶到中國只是為了達到傳教的目的，但這種交流“作為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繫的最高範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第4卷“天學”，第2分冊，第693-94頁。謝和耐（Jacques Gernet）對此也有精到分析。見謝和耐《17世紀基督徒與中國人世界觀之比較》，收入《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耿昇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附錄”，第305-24頁。

34 白佐良、馬西尼：《義大利與中國》，蕭曉玲、白玉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68頁。

35 朗宓榭：《西方漢學研究的語境》，見《中國現代學科的形成》（《近代中國研究集刊》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頁。論者還強調了認識“前現代”民族概念與“現代”國民意識之民族概念的區別，對理解歐洲狀況以及歐美 nation 概念史至關重要。歐洲前現代 nation

出，在近代之初（耶穌會士來華之初），科學還沒有與哲學分離；知識仍被視為一個整體，科學也沒有分化成眾多門類。守護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也才能更好理解耶穌會士所援之“西”所隱含的意味。舉例來說，艾儒略（Jules Aleni）的《職方外紀》和《西學凡》，論及歐洲各國在學制上的安排，就有必要立足這樣的背景去理解。

《職方外紀》卷二之“歐邏巴總說”介紹了“歐邏巴建學設官之大略”，除指明歐邏巴諸國大學、中學、小學之建制，特別強調大學分為四科：“一曰醫科，主療病疾；一曰治科，主習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興教化。皆學數年而後成。”³⁶《西學凡》則按照“六科”介紹了17世紀西方教育制度及學校狀況：“文科謂之勒鐸理加（*rethorica*），理科謂之斐錄所費亞，醫科謂之默第濟納（*medcina*），法科謂之勒義斯（*leges*），教科謂之加諾搦斯（*canones*），道科謂之陡錄日亞（*theologia*）。”並強調其修習次第為先“文科”，後“理科”，再是其他的“醫科”、“法科”、“教科”、“道科”。所謂“文科”，包括“古賢教訓”，“各國史書”，“各種詩文”，“自撰文章議論”等，大致涉及基本的訓練，定位於“辟諸學之大路”：“文學已成，即考取之，使進于理學”。這裡所言之“理學”，表述為“斐錄所費亞”（*Philosophia*，今譯作“哲學”），所揭示的正是耶穌會士來華之初的情形——科學還沒有與哲學分離。同時，中西溝通既由耶穌會士肇其端緒，也烙上相應的痕跡——“教”與“學”之結合。強調“學不歸原天帝，終非學也”，是耶穌會士論學的基本出發點。書中對“道學”的定位也頗為用心，指其乃“超生出死之學”，總括“人學之精”與“天學之奧”，而“他學總為無根，不能滿適人心，以得其當”。故大西諸國雖留心諸學，然“無不以陡錄日亞為極為大”。³⁷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耶穌會士之“援西入中”本有“迎合”中國之一面；他們的譯介工作也往往有中國士人參與其中。由於摻雜了這些因素，要辨析耶穌會士闡述西學分科觀念所援據的“思想資源”，無疑是困難的。³⁸不過，透過耶穌會士闡述的分科觀念，可以明確的是，這正是當時西方所形成的對知識的看法。審視歐洲大學教育的傳統通常會上溯到希臘人所奠定的“七種自由藝術”（*seven liberal arts*）。後來伊西多（*Isidorus*

概念，指的是歷史形成的與地域、語言、習俗密切相關的社會文化所決定的“族類”或“居民”等，隨著現代共和政體與公民（*citizen*）意識在法國、美國、英國的崛起，現代 *nation* 概念的內涵才開始真正體現出來，原先那種多少帶有“自然而然”意味的語言文化共同體便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共同體的抽象觀念，也就是國籍觀與所有公民理想組合體的觀念，以及公民對“他們的國家形態”、“他們的共和國”的認同。見方維規《論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與“中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2002年4月號，總第70期，第33-43頁。

36 謝方：《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9-70頁。

37 艾儒略：《西學凡》，《天學初函》（一），台北：學生書局，1965年，第27-51頁。

38 論者提出了“天學的聖學化”問題，指出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教中三大柱石”在接受“天學”時，最初是以一種擬同的態度將“天學”納入聖學體系，以證明接受、學習先進的西洋科學是正當的。見孫尚揚、鐘鳴旦《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第206頁。研究者還指明，格物窮理在程朱學派那裡乃由智達德的一個起點，徐光啟卻促成了智與德的分離，提出“格物窮理之學”。由此“搭上了一座引渡西學的橋樑”，便於西方知識“循序進入”。見樊洪業：《從“格致”到“科學”》，《自然辯證法通訊》，1988年第3期，第39-50頁。此外，論者檢討“西學中源”說，還指明“西學中源”一說出現於明末，是為“縮小中西學術的隔閡，引進西方科學（主要是天文曆法和數學）而提出的”。見王揚宗《明末清初“西學中源”說新考》，劉純、韓琦等編《科史薪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頁。

Hispalensis) 在《詞源》(Etymologies, 又譯作《詞源學》、《語源》等) 將此分為“三科”(trivium, 即文法、修辭學、辯證法) 和“四藝”(quadrivium, 即算術、幾何、天文、音樂), 奠定了歐洲中世紀的課程設置。1540年正式成立的耶穌會代表著歐洲致力於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耶穌會士的“陶成”便是照此展開。³⁹相應的, 來華耶穌會士也傳遞了15、16世紀歐洲所形成的對知識的認知, 《西學凡》便可作為“歐西大學所授各科之課程綱要”。⁴⁰

問題轉向新教傳教士19世紀所開展的“援西入中”的工作, 則可以明確是, 儘管西方對各學科的認知已有較為清晰的圖景, 但將此援引到中國, 同樣呈現出逐步清晰的過程。要完整展現其中的歷史脈絡是不可能的, 然透過新教傳教士所辦《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西聞見錄》等雜誌, 不難看出學科意識的逐漸提升。那段時間較有影響的一些中文刊物, 就顯出這方面的特點。1853年創刊於香港的《遐邇貫珍》, 對此就有清楚交代, “雖聖書未嘗教以技藝之學, 然崇奉聖道之國, 必能于天文地理、圖繪醫藥, 與夫一切技藝之事, 罔不手敏心靈, 悉臻巧妙。”⁴¹強調各種“技藝之事”, “何莫非崇奉聖經之效”, 同樣是將“學”歸原於“聖道”。《六合叢談》之編, 旨在“通中外之情, 載遠近之事, 盡古今之變。”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在《六合叢談小引》中, 就突出了西人之學, 如何按照分科的架構進行安排。他特別舉例說:

一為化學, 言物各有質, 自能變化。精識之士, 條分縷析, 知有六十四元, 此物未成之質也。一為察地之學, 地中泥沙與石, 各有層累, 積無數年歲而成。細為推究, 皆分先後, 人類未生之際, 鴻濛甫闢之時, 觀此朗如明鑒, 此物已成之質也。一為鳥獸草木之學, 舉一骨, 即能辨析入微, 知全體形狀之殊異; 植群卉, 即能區別其類, 知列國氣候之不同。一為測天之學, 地球一行星耳, 與他行星同。遠地球者為定星, 定星之外, 則有星氣。星氣之說, 昔以為天空之氣, 近以遠鏡窺之, 始知系恒河沙數之定星所聚而成。今之談天者, 其法較密于古。中國古時有天元求一諸法, 今泰西代數, 最深者為微分法, 以之推算天文, 無不觸處洞然矣。一為電氣之學, 天地人物之中, 其氣之精密流動者曰電氣。發則為電, 藏則隱含萬物之內。昔人畏避之, 以其能殺人也。今則聚為妙用, 以代郵傳, 頃刻可通數百萬里。別有重學流質數端, 以及聽視諸學, 皆窮極毫芒, 精研物理。

不僅指出中國“載籍極博, 而所紀皆陳跡也”, 還突出西人之學, 如何“精益求精, 超前軼古”, 如何“啟明哲未言之奧妙, 闢造化未洩之奇”, 總之一切皆“窮極毫芒, 精

39 耶穌會士的“陶成”, 是一個漫長的學習過程, 它所強調的是學習神學需要文理和自然科學的預備時期, 因為這些科目能給神學鋪路並有助於完全認識和實際應用。這些科目包括: 文學(修辭學和文法)、語言(古拉丁、希臘及希伯來文、傳教區的語言)、邏輯、倫理學、形上學、自然科學(物理、數學)。見鐘旦鳴《“格物窮理”: 17世紀西方耶穌會士與中國學者的討論》, 魏若望編《南懷仁——魯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年, 第454-79頁。

40 徐宗澤編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 上海: 中華書局, 1949年, 第289頁。

41 《新舊約書為天示論》,《遐邇貫珍》第3卷第2號, 1855年2月, 第4頁。

研物理”。所言及的西人之學，包含有“化學”、“察地之學”、“鳥獸草木之學”、“測天之學”、“電氣之學”等，這裡已清楚表明西人之學，主要是基於不同的知識解釋世間萬物，然而該如何命名這些“學”，尚未有規範的學科名稱。⁴²發行至第二卷時，該刊還表示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學問之道無窮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紛囂變化，莫可端倪。前卷所載略備，而猶有未盡者，今再臚於篇。”⁴³那段時間出版的眾多雜誌，大都有類似的宗旨。1872年出版的《中西聞見錄》，指出“西國之天學、地學、化學、重學、醫學、格致之學及萬國公法、律例文辭，一切花草樹木、飛禽走獸、魚鱉昆蟲之學，年復一年，極深研幾。”“中國人于外國學問及一切器具並各國風俗，果能博見廣識，擇善而從，未始不可為他山之助”。⁴⁴上述對各學科的說明，旨在證明西方各國在“學”這一環節具有的獨創性，但不難看出，對於具體的學科名稱，未必有確定的術語。

正是在此過程中，來華西人也試圖從整體上對“西學”進行介紹。具體地說，在從事譯述工作時，也在考慮“所譯各書若何分類，若何選擇”。傅蘭雅（John Fryer）《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就寫道：“初譯書時，本欲作大類編書，而英國所已有者雖印八次，然內有數卷太略，且近古所有新理新法多未列入，故必察更大更新者始可翻譯。後經中國大憲諭下，欲館內特譯緊用之書，故作類編之意漸廢，而所譯者多零件新書，不以西國門類分列。平常選書法，為西人與華士擇其合己所緊用者，不論其書與他書配否，故有數書如植物學、動物學、名人傳等尚未譯出。另有他書雖不甚關格致，然於水陸兵勇武備等事有關，故較他先為講求。”⁴⁵這段話甚值重視，可以說西人之譯書，也試圖按照西國各學科之“門類分列”。來華西人對“西學”整體上的介紹，當推艾約瑟（Joseph Edkins）的“西學啟蒙十六種”。1880年艾氏司譯總稅署，授命於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將“泰西新出學塾適用諸書”譯成中文。歷時五載，成西方啟蒙讀物15種；隨後艾氏又專門寫了《西學略述》一書，合為“西學啟蒙十六種”，1886年由北京總稅務司署印行。⁴⁶這方面，教會出版機構的工作尤其值得檢討，透過其出版的書目，可以看出其認知學科的方式，正可與中國士人所整理的西學彙編資料進行對照。

益智書會（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1894年出版的《益智書會書目》，所涉及的分類包括：(1) Mathematics（數學），(2) Natural Sciences（自然科學），(3) History（歷史），(4) Geography, Maps, &c.（地理、地圖），(5)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42 偉烈亞力：《〈六合叢談〉小引》，《六合叢談》第1號，上海：墨海書館，1857年，第1-2頁。

43 偉烈亞力：《〈六合叢談〉二卷小引》，《六合叢談》第2卷第1號，1858年，第1-4頁。

44 《〈中西聞見錄〉序》，《中西聞見錄》第1號，1872年8月。

45 傅蘭雅：《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格致彙編》第3年第5卷，1880年。

46 艾約瑟：《〈西學略述〉自識》，原刊《萬國公報》第5冊（光緒十五年五月），見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第521-22頁。《西學略述》依諸原本者15種，分別為：《格致總學啟蒙》、《地志啟蒙》、《地理質學啟蒙》、《地學啟蒙》、《植物學啟蒙》、《身理啟蒙》、《動物學啟蒙》、《化學啟蒙》、《格致質學啟蒙》、《天文啟蒙》、《富國養民策》、《辨學啟蒙》、《希臘志略》、《羅馬志略》、《歐洲史略》。見艾約瑟：《敘》，《西學略述》，北京總稅務司署印行，1886年，第1頁。還可舉證益智書會所輯《西學九種》，上海：華美書館，1899年。

(宗教與哲學)，(6)Readers (讀物)，(7)Miscellaneous Works (綜合性著作)，(8)Addendum (補遺)。⁴⁷單就這個目錄來說，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分類只有寥寥幾項，與晚清西學彙編資料動輒二、三十項相比，適成鮮明的對照。其中重要的區別便是“Natural Sciences”的分類，將聲、光、化、電之類，悉歸於其中。同時，這裡用英文來表示，則多少說明這些分類在西方或已成共識，但在中國仍是問題。

再來看廣學會的工作。廣學會的前身乃1887年韋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在上海組織的“同文書會”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a)，1894年改稱“廣學會”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同文書會”之設，為的是“擺印善書，散佈天下。非敢謂足補中土所不逮也，不過精益求精，治益求治，為中土添錦上添花耳。”不過，在規劃出版事業時，並未按照明晰的學科進行，只是表示，“書分兩種，一載天文地理及一切格致，足擴學人之智識。其事巨，故其措辭不敢不盡也。一載人物花木及一切政事，以牖童稚婦女之聰明。其事淺，故措辭不敢過深也。”所列出的各書目，也只是將各書羅列，未曾進行學科分類。⁴⁸李提摩太總結“廣學會”六年的成績時，則進一步表示，“會中命意所在，務欲推廣西國之學於中國。”依其所見，中國的問題正在於“苦於不知五洲萬國之事，而未究其學耳”。“廣學會”之設，正是為著“遍采泰西有裨於國計民生之學，著為論說，勒為成書”，“華人

47 內中也有分類：(1)Mathematics, 《代數備旨》、《代數須知》、《筆算數學》、《心算初學》、《心算啟蒙》、《演算法須知》、《微積須知》、《圓錐曲線》、《曲線須知》、《形學備旨》、《動水學圖說》、《靜水學圖說》、《重學圖說》、《重學須知》、《量法須知》、《權量圖說》、《八線備旨》、《對數表》、《三角須知》。(2)Natural Sciences, 《聲學揭要》、《聲學須知》、《全體圖說》、《全體須知》、《天文揭要》、《天文圖說》、《天文須知》、《天文啟蒙》、《活物學》、《百鳥圖說》、《植物學》、《植物學中西名目表》、《植物圖說》、《植物學啟蒙》、《化學器》、《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或啊學易知》、《化學須知》、《化學啟蒙》、《化學衛生論》、《化學圖說》、《力學須知》、《電學圖說》、《電學須知》、《地學指略》、《地學須知》、《地學啟蒙》、《孩童衛生編》、《熱學圖說》、《熱學須知》、《延年益壽論》、《衛生旨要》、《幼童衛生編》、《百蟲圖說》、《辨學啟蒙》、《光學圖說》、《光學揭要》、《百獸圖說》、《西藥大成藥品中西名目表》、《礦學須知》、《礦石圖說》、《測候器說》、《顯微鏡遠鏡說》、《金石中西命名表》、《格物入門》、《光學須知》、《重學水學氣學器說》、《格致質學啟蒙》、《氣學須知》、《全體通考》、《省身指掌》、《身理啟蒙》、《保身衛生部》、《百魚圖說》、《居宅衛生論》、《西學略述》、《格致總學啟蒙》、《動物學新編》、《動物理學圖說》、《動物類編》、《動物學啟蒙》。(3)History, 《聖會史記》、《大英國志》、《歐洲史略》、《希臘志略》、《羅馬志略》、《俄史輯譯》、《俄國志略》、《聯邦志略》、《萬國通鑒》。(4)Geography, Maps, &c., 《天文地理圖說》、《地勢略解》、《地理初階》、《地理初枕》、《地理須知》、《地理全志》、《地理志略》、《地理略說》、《地志須知》、《猶太地理撮要》、《聖經地理全圖》、《地勢圖說》、《猶太地理志》、《西印平圖地球圖》。(5)Religion and Philosophy, 《二約釋義叢書》、《西經實物圖說》、《知識五門》、《古教匯參》、《心靈學》、《善惡理證》、《格物探原》。(6)Readers, 《發蒙益慧錄第一》、《發蒙益慧錄第二》、《發蒙益慧錄第三》、《初學階梯》。(7)Miscellaneous Works, 《格致彙編部》、《中西關係略論》、《自西徂東》、《西畫初學》、《測繪器說》、《畫形圖說》、《畫器須知》、《肄業要覽》、《汽機鍋爐圖說》、《西禮須知》、《戒禮須知》、《眼科指蒙》、《公法會通》、《萬國公法》、《西國樂法啟蒙》、《富國策》、《富國養民策》、《富國須知》、《逐月星象圖》、《格物大圖部》。最後之 Addendum, 為《代形合參》一書。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Descriptive Catalogue and Price List of The Books, Wall Charts, Maps, e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4, pp.1-34.

48 韋廉臣：《同文書會實錄》，《萬國公報》第14號，1890年3月。

之見之者，如以為先路之導，頂門之鍼也，則不徒敝會之幸也。”⁴⁹1901年出版之《廣學類編》，由英國唐蘭孟編輯，李提摩太鑒定，吳江任廷旭申甫譯。計分12類：史事，地理，文學，格致，算學，商務，醫藥，權度，婚禮，家務，營造，遊獵。⁵⁰不難看出，12類的區分，甚至沒有明晰的學科概念。

略為勾畫來華西人“援西入中”所展示的片斷，可以看出西人對於西學分科也並非一開始就有清晰的圖景，仍然需要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才能較好把握。強調“西方”並非已知的範疇，並無意確立基於西方“本質主義”的認知，似乎有一個清晰的西方知識體系援引到中國。然而，確立“歷史的維度”，當有俾瞭解來華西人引進西方知識的背景。重要的是，在討論西方知識對中國的滲透時，當進一步認識到所謂“西方知識”或“西方學科”都是歷史性的範疇，其圖景並不是清晰的，難以作為“已知”的背景作為討論的前提。更複雜的是，擔當此一工作的來華西人援引知識的方式，以及基於“策略性”的考慮，還表明所援引的西方知識已是基於中國本土展開，迎合了中國本土對於知識的認知。這樣所謂“西方”，亦加入了“中國”因素。

三、西學彙編資料的編輯

有道是“要把金針度於人”，正是因應于“采西學”的需求，晚清出現了多種西學彙編資料，可視作探索“西學門徑”的結果。值得重視的是，這些西學彙編資料的編輯大體均是按照知識分科的架構對中譯西書進行分類，這樣也提供了審視晚清認知西學的重要資源。前面所列舉的檢討晚清“西學東漸”的論作，不少也是依據這些資料提取資料資訊。這裡也頗有必要對此進行分析，從中可以看出守護“歷史的維度”的重要性，因為這些彙編資料儘管是按照西學分科對相關資料進行安置，但內中也清楚顯示，不僅分科觀念的成長有一個歷史的過程，同時，即便按照分科觀念進行的安置，也並非沒有可議之處。康有為描述接觸西學之初始，曾有這樣的評說：“中國西書太少，傅蘭雅所譯西書，皆兵醫不切之學，其政書甚要，西學甚多新理，皆中國所無，宜開局譯之，為最要事。”⁵¹相似的意思，梁啟超也有所闡述，“吾中國之治西學者固微矣，其譯出各書，偏重于兵學藝學，而政治資生等本原之學，幾無一書焉。”不寧唯是，對於治西學當有的選擇——“如某科當先，某科當後，欲學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梁還指出普遍存在的情形是“不得其途經”，“能有識抉擇者蓋寡焉”。⁵²康有為、梁啟超上述常被徵引的話，自有其深意在，絕非僅僅關涉於譯書，而是展現了晚清士人在分科觀念影響下，對西學的接納頗為關注探尋“西學門徑”，以便更好地“采西學”。梁啟超《讀

49 李提摩太述，鑄鐵盒主譯：《廣學會第六年紀略》，《萬國公報》第60冊，光緒十九年十二月，此據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275頁。

50 唐蘭孟編輯，李提摩太鑒定：《廣學類編》，任保羅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年第2版。

51 《康南海自編年譜》，見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第4冊，第119頁。

52 梁啟超：《論學日本文之益》、《東籍月旦》，《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第1冊，第80-82，82-85頁。

西學書法》就表達了對如何讀西書的關切：“譯出西書數百種，雖其鮮已甚，然苟不審門徑，不知別擇，驟涉其藩，亦頗繁難矣。”⁵³這裡也反證此前西書之出版，尚缺乏“門徑”，故梁啟超才致力於這方面的工作。這也點出這些工作的展開，為的是提供“西學門徑”，顧燮光即有這樣的看法：梁氏之《西學書目表》及《讀西書法》出，“學者方有門徑”。⁵⁴

西學彙編資料的出現，也算中西交流進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稍早出現的著述，大致是按照一定的類別，對“西事”、“洋務”及“西學”進行彙集。沈粹生曾搜輯出洋日記及古巴華工供詞，為之撮要刪繁，加以按語，以類相從，計分十六卷：程紀、交涉、聘問、禮制、國用、政治、形勢、武備、文藝、民俗、宮室、善舉、器具、商賈、教會、物產。⁵⁵張自牧《蠡測卮言》十卷，專談洋務，論西洋格致會分十五家：一、天文、算學；二、重學及機器之學；三、測量之學；四、植物學；五、農務學；六、數學，謂考校貨物出入多寡之數也；七、世務學；八、聲學、熱學、光學、電學；九、天時、風雨、寒暑之學；十、地理學；十一、化學；十二、地內學，謂辨別方物也；十三、金石學；十四、人學，謂族類、肥瘠、壽夭之別；十五、醫學。⁵⁶王韜也曾編有《西學輯存六種》，收有《西國天學源流》、《重學淺說》、《西學圖說》、《西學原始考》、《泰西著述考》、《華英通商事略》。在所寫《自序》中，王韜解釋了從事這項工作的用心：“學問之道無窮，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紛囂變化，莫可端倪。”將過去著述重新刊行，乃“近世之尚西學談洋務者，徒襲皮毛，咀糟粕而未窺其實際。余寢饋於此殆四十年，雖未稔其語言文字，而頗能深悉其理灼知其情偽。”⁵⁷上述種種，也算是試圖整體把握西學之嘗試，正類似於李之藻所輯之《天學初函》。⁵⁸只是像這樣對西學的把握，所涉及的著述還頗為有限，難以說明問題。

晚清對西學整體的把握，尤其是關注于“西學門徑”，可以參照顧燮光的總結。顧氏在《譯書經眼錄·自序》曾述及其中所發生的轉變：“清光緒中葉，海內明達懲於甲午之釁，發奮圖強，競言新學，而譯籍始漸萌芽。新會梁氏著《西學書目表》及《讀西書法》，學者方有門徑。老友徐君以憊病其略焉，乃仿提要例而有《東西學書錄》之作，蔡子民先生敘之。是時燮光醉心新學，日以讀譯書，是務為補其闕，由徐君合印以行，而子民先生複識之。匆匆三十餘年矣，嗣後燮光遨遊南北，迄光緒三十年止，又讀譯籍約千餘種，乃踵徐書前例，著為《譯書經眼錄》一書，棄諸行篋有年。”⁵⁹此

53 梁啟超：《讀西學書法》，夏曉虹輯《〈欽定四庫全書〉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下冊，第1159頁。

54 顧燮光：《譯書經眼錄·自序》，見《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2003年，第401頁。

55 沈粹生：《西事類編》，申報館仿聚珍板印，光緒十年。

56 張自牧：《蠡測卮言》，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上海著易堂，第十一帙。

57 王韜：《自序》，《西學輯存六種》，1890年。

58 《天學初函》合為兩編：一為理編，主要包括介紹天主教理及世界地理的諸書；一為器編，為論數學、天文、水利等的譯書。每編收書10種，共計20種，1628年刊刻。“理篇”與“器篇”，頗合“道”“器”之分的意味，不管怎樣，實際反映出那個時代對西學整體上的認識。見李之藻《天學初函》，台北：學生書局，1965年。

59 顧燮光：《譯書經眼錄·自序》，見《近代譯書目》，第401頁。

段文字之所以值得重視，在於其大致描繪了晚清西學彙編資料的情況，這裡所提及的《西學書目表》、《東西學書錄》、《譯書經眼錄》等資料，就顯示了斯時在整體上對西學的把握，尤其在類目上的安置情況。而要編定這樣的資料，也是秉持對西學各學科的看法。此亦說明，對學科次第的認知並非無關宏旨，昭示了對西學所做取捨。王韜即表示，“近時所譯西國各書，紛然錯出，亦甚夥矣，門徑既多，頭緒又繁，閱者如適寶山，茫然不知所取材，何則？以無貫串之者也。”所謂“貫串”，自是意味著按照不同的分科合眾書為一書。⁶⁰

顧燮光所提及的西學彙編資料，只是其中之卓有影響者，實際上這方面的文獻甚多，其中1888年出版之《西學大成》，是較早出現的一部。該書言明是為“有志泰西經濟之學者”所編定：“一、是編原為有志泰西經濟之學者苦無門徑可尋，故區為十二門，各門皆有實用，非托空說。二、有志者苟得是編，各隨其質之所近，專習一門，亦可成家。若因之觸類旁通，以馴致於大成，則易如反掌。三、西國格致之學，以數理為入門，上而量天測地，下至製造律呂，無不神明理數，故是編以算學為全書之冠，而各門則遞次而降。”該書介紹的“西學門徑”包括算學、天學、地學、史學、兵學、化學、礦學、重學、汽學、電學、光學、聲學等12門。⁶¹從類目上看已是基於分科觀念彙編西學著作，然而如具體分析其中所收著述，就不難發現問題所在。譬如，“史學”門所收錄的書包括有《大英國志》、《聯邦志略》、《列國歲計政要》、《列國海戰記》、《萬國公法》、《星輶指掌》，僅此而言，亦可知“史學”之納入出於中外溝通之需要，並且主要是立足於“富國強兵”來考慮所選書目。職是之故，史學的分科意識，還很缺乏，因為收於“史學”部分的這些書籍，於今而言，不少難入“史學”之門。如《萬國公法》，在今天無疑就會歸到政治學或法學門類。實際上，就上述分類來說，不少都是值得斟酌的，如歸到“天學”門類的不少都屬於“算學”，歸於“地學”、“史學”門類的許多書，也可分到其他門類去。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最基本的還在於，當時並沒有清晰的學科分類概念，事實上也不能這樣要求。可以補充說明的是，1897年出版之《續西學大成》，情況也沒有多少改變。該書所列門類增加到18類：格致學，重學（力學），汽學（水學），電學，光學，聲學，化學，天學，地學，兵學，工程學，測繪學，算學，史學，政學，農學，文學。儘管分科更細，有了“史學”、“政學”與“文學”各門，然從所收書目來看，

60 這方面的詳細討論，可參見章清《“采西學”：學科次第之論辯及其意義——略論晚清對“西學門徑”的探討》，《歷史研究》2007年第3期。

61 具體包括：算學10種：《勾股義》、《圓容載義》、《平三角法舉要》、《堆垛求積術》、《少廣繩壘》、《代數幾何》、《借根方勾股細草》、《周髀算經》、《造表簡法》、《教學拾遺》；天學9種：《經天》、《該揆日候星紀要》、《五星紀要》、《弧三角舉要》、《斜弧三邊求角補術》、《橢圓正術》、《測圓求周術》、《測圓密率》、《天學啟蒙》；地學6種：《地學全志》、《繪地法原》、《航海簡法》、《使西紀程》、《鐵路紀略》；史學6種：《英國志》、《聯邦知略》、《列國歲計政要》、《列國海戰記》、《萬國公法》、《星輶指南》；兵學6種：《陸操新義》、《火器略說》、《海戰指要》、《艇雷紀要》、《爆藥紀要》、《營壘圖說》；化學4種：《化學啟蒙》、《化學初階》、《化學分原》、《化學鑒原續編》；礦學2種：《井礦工程》、《開煤要法》；重學三種：《重學圖說》、《重學入門》、《重學彙編》；汽學3種：《汽機入門》、《汽機新創》、《汽機發報》；電學4種：《電學源流》、《電學綱目》、《電學入門》、《電學問答》；光學2種：《光學》、《量光力器圖說》；聲學1種：《聲學》。王西清、盧梯青編：《西學大成》，上海：醉六堂書坊，1895年，“例言”。

仍是“史學”與“政學”不分；收於“政學”與“文學”的書目，同樣產生著與今日視為“經濟”及“哲學”等學科糾葛不清的情形，仍沒有清晰的學科概念與界限。⁶²同樣出版於1897年之《東西學書錄總敘》，也提供了相似的例證。該書分上下兩卷，卷上包括“天學”、“地學”、“地志學”、“學制”、“兵學”、“農學”、“工學”、“商學”、“法律學”、“交涉學”；卷下包括“史學”、“算學”、“圖學”、“礦學”、“化學”、“電學”、“光學”、“聲學”、“重學”、“汽學”、“醫學”、“全體學”、“動物學”、“植物學”。這樣的分類，多少有些混亂，特別是“史學”置於下卷，就顯得頗為隨意。⁶³這裡透露出的資訊是，按照今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分野，“援西入中”的進程明顯是先在自然科學及技術科學層面率先有所突破，相應的對它的認知也率先有較為明確的分科觀念，所收書目大體還比較符合。但稍後啟動的社會科學及人文類便落後於此。不僅分科出現稍晚，而且將某些書目歸到某一類目中也存在種種問題。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最為學界重視。審視現代學科的形成，該書無疑是重要資源。書前之《讀西學書法》，還表達了梁對如何讀西書的關切：“譯出西書數百種，雖其鮮已甚，然苟不審門徑，不知別擇，驟涉其藩，亦頗繁難矣。”⁶⁴《西學書目表》按照學、政、教對西書進行分類，除教書不錄外，其餘諸書，分為三卷。上卷為“西學”諸書：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汽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中卷為“西政”諸書：史志、官制、學制、法律、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為雜類之書：遊記、報章、格致總、西人議論之書、無可歸類之書。在該書《序例》中，梁即點出是書之編是因應於門人提出的“應讀之西書及其讀法先後之序”，內中也指明“各書之長短，及某書宜先讀，某書宜緩讀”，雖非詳盡，然初學觀之，“亦可略識門徑”。可以說梁明確提出了西學“門類之先後”問題，顯示其所編“西學書目”是有所本的：“西學之屬，先虛而後實。蓋有形有質之學，皆從無形無

62 其中算學 5 種：《數學啟蒙》、《西學新法直解》、《曲線數理》、《曲線發明》、《微積數理》；測繪學 6 種：《繪地法原》、《繪圖理法》、《測繪器說》、《畫器體用》、《行軍測繪》、《丈田測繪章程》；天學 6 種：《天文西說》、《西法天算求原》、《天文捷算》、《日月測算》、《諸星測算》、《天文設問列表》；地學 2 種：《地學總論》、《地質全志》；史學 9 種：《中西交涉通論》、《中西近事圖說》、《交涉通商表》、《中西記載》、《中西大局論》、《中西通商原始記》、《中國籌防記》、《西域回教考略》、《中國新政錄要》；政學 3 種：《富國精言》、《富國養民策》、《富國理財說》；兵學 3 種：《西法練兵說》、《英國水師律例》、《德國軍制述要》；農學 4 種：《養民新說》、《化學農務》、《染布西法》、《蔗糖西法》；文學 9 種：《西國學校》、《泰西實學精義》、《新學芻言》、《西學淵源記》、《心智略論》、《思辨學》、《心學公理》、《心才實用》、《西國行教考》；格致學 4 種：《格物啟蒙》、《格致總論》、《格致小引》、《高厚求原》；化學 2 種：《化學要略》、《氣球考》；礦學 4 種：《礦學要領》、《礦產興利論》、《礦石圖說》、《煉鋼新說》；重學 5 種：《重學數理》、《重學探源》、《靜重學》、《動重學》、《重學說器》；汽學 2 種：《氣學條理》、《水學要端》；電學 2 種：《電學原理》、《電學新理》；光學 5 種：《光學入門》、《光學新理》、《光學新法圖論》、《光學釋器遠鏡說》、《光學釋器顯微鏡說》；聲學 3 種：《聲學條論》、《聲學精理》、《聲學新理》；工程學 4 種：《行軍鐵路工程》、《鐵路利益論》、《製造述略》、《煉石編》。參見《續西學大成》，1897 年出版。

63 會稽沈桐生述，山陰繆紹瑜校，山陰張之梁校：《東西學書錄總敘》，作者署“光緒二十三年四月”於“上海南洋公學”，讀者用書齋光緒二十三年（1897 年）印。

64 梁啟超：《讀西學書法》，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冊，第 1159 頁。

質而生也。故算學重學為首，電化聲光氣等次之。天地人物等次之，醫學圖學全屬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屬，以通知思國為第一義，故史志居首，官制學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後能強，故農礦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農者地面之產，礦者地中之產，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後也。船政與海軍相關，故附其後。”⁶⁵應當承認，無論是“學科”的分類，還是具體的安置，《西學書目表》都有可稱頌之處。只是同樣也顯示“舊瓶”不能裝“新酒”的情形。特別是卷下，命名為“雜類之書”，多少表明對這些資源梁啟超還不知當如何安置。如分出“遊記”、“報章”就殊難理解，此乃就體裁論，非按內容來分。而“格致總”類目的出現，則表明在分科觀念的主導下，在寬泛意義上討論“西學”、“格致”諸書，反倒沒有安置的空間。同樣的，區分出“西人議論之書”，也說明包括《自西徂東》、《中西關係略論》等在分科觀念下也沒有安置之所。再看所謂的“無可歸類之書”，更表明對此梁還不知該如何安置，亦即是意味著在學科分類上還不夠完整，故此在今日看來不難安置的書，在那個時代都成了問題，如《佐治芻言》一書，既稱其為“言政治最佳之書”，但由於當時還沒有明確的“政治學”的學科分類，故只有將此歸到“無可歸類之書”；同樣說明問題的是《辨學啟蒙》一書置於此。實際上，就整個“無可歸類之書”來看，都說明有多種因素影響到這些書的編輯。⁶⁶如對照前面提到的《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也能發現富於意味的一幕，按照這個分類，“史志”類的書共計6種，分別為《四裔編年表》、《埏紘外乘》、《俄國新志》、《法國新志》、《東方時局論》、《西美戰史》等。“政治”方面書3種：《佐治芻言》、《列國歲計政要》、《美國憲法纂釋》。“交涉”方面的書7種：《東方交涉記》、《英俄印度交涉書》、《公法總論》、《各國交涉公法論》、《各國交涉便法論》等。此即可看出學科分類知識如何在這些環節體現出來。即以上列各書來說，在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裡，在此作為“政治”書的《列國歲計政要》，和作為“交涉”類書的《東方交涉記》、《英俄印度交涉書》，都歸在“史志”部分。這也意味著，當我們查閱這些分科資料時，當清楚其彙編工作的特定年代。

尚可進行對比的是各種“經世文編”資料。如同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揭示的，清學分裂的主要原因，乃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正統派公然舉叛旗。⁶⁷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者也強調，1890年後的10年是中國思想發展重要的分水嶺：儒家經世致用的思想傳統趨於告終，而尋求今天仍在摸索中的思想新方向被提了出來。⁶⁸無須多言，經世致用思想確算是晚清中西思想

65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冊，第122-26頁。

66 “無可歸類之書”總計收有這樣一些著作：《佐治芻言》、《辨學啟蒙》、《華語考原》、《美國博物大會圖說》、《幼學操身》、《幼學初階》、《初學初階》、《發蒙益慧錄》、《啟悟要津》、《造洋飯書》、《西法食譜》、《古教匯參》、《救世教益》、《聖會史記》、《二約釋義叢書》、《昕夕閒談》、《百年一覺》。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冊，第1144-1145頁。

67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朱維鈞編校《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59。

68 張灝(Hao Chang)《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211。

溝通的重要津梁，各種“經世文編”資料，也成為西方知識如何被接引的維度。自晚清至民國初年，曾有多達20餘種的“經世文編”相與廣續。這一現象的出現，固可說是“經世致用”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時也是因為對“經世”之理解，代有不同。⁶⁹單從各種“文編”的類目看，即可發現其中所顯示的“知識”之遞升，不同版本的“經世文編”實際構成“呈現”西方知識的基本資源。⁷⁰

劉廣京稱魏源所撰《皇朝經世文編敘》“不啻為晚清經世運動之宣言”，⁷¹可謂見道之論。《皇朝經世文編》計分八綱六十五目，由於立于傳統學術架構，正可以此檢驗後出之各種“經世文編”如何因應風氣之轉移。葛士濬即是慨於“世局既有變遷，議論因之日積”，1888年編成《皇朝經世文續編》刊行。其中最突出的即是“洋務”思想納入“經世文編”中。專設有“洋務”一綱，系以七目：洋務通論、邦交、軍政、教務、商務、固圉、培才。內中文字除我們熟知的那些洋務官員，以及出使外洋的外交官的奏疏文章，還收有丁韋良（WAP Martin）有關外交的文章15篇，而引人矚目的是將“算學”列于“文學”目下。按葛的見解，“《賀編》學術文學類于經子史學大綱暨諸儒論文，採取略備，而仍不及算學。”同時“天文、樂律實古聖法治之本原，而制器測地尤近今經綸之要務，非可以一藝目之，況其致用尚不止此。闕而莫載，遺憾實多。”⁷²於是將有關天文算學的文章析為三卷，俯列“文學卷”。認識到天文算學的重要性，已是“援西入中”的直接後果，這裡還顯示出對於這些新知，該如何安置，實已構成無法避遁的問題，在沒有更好辦法的情況下，只好“且將新酒入舊瓶”。這一情況也反映在1897年出版的《皇朝經世文三編》中。該書體例襲自葛編，卷首即是“學術”，分別為（1）原學上，（2）原學下，（3）法語，（4）廣論上，（5）廣論中，（6）廣論下（附醫理），（7）測算上，（8）測算中，（9）測算下，（10）格致上，（11）格致下，（12）化學。就此而言，可以明確的是“學術”的內容已有較大改觀，然其所做取捨，似乎又遠不是那麼一回事。譬如“學術”裡列出“化學”，本已蹊蹺，耐人尋味的是收錄的文章：《中外化學名詞異同考》、《物體凝流二質論》、《物體本原》、《電報》、《電學考》、《（問鍛）煅煉金質試驗熔度而電池之金何以必用一陰一陽方能生電說》。用不著特別指明，其中一些文章，歸到“化學”，無論如何是不恰當的。

之所以要提及各種“經世文編”資料，原因無他，晚清出版的諸多西學彙編資料，

69 如俞樾在《皇朝經世文續編序》中談到的，“近年風會日辟，事變益繁。如洋務為今日一大事，非原書海防所能盡也；奉天、吉林、新疆、臺灣各設行省，因地制宜，非原書吏治所能盡也；開礦自昔有禁，而今則以為生財之大道，非原書錢幣所能盡也；軍國之用，取給抽厘，非原書權酷所能盡也；有輪船以行江海，近又有輪車以行陸，非原書漕運所能盡也；中西算學日新月盛，朝廷辟館以造就人才，且寬其格以取之，非原書所能盡也。”見俞樾：《皇朝經世文續編序》，見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

70 參見日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清朝經世文編總目錄》，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無出版年月；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尤其是第11章“晚清‘經世文編’的編纂”。

71 劉廣京：《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收入《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頁364。

72 葛士濬：《皇朝經世文續編·例言》，廣百宋齋校印本，光緒十七年（1891）。

不少即是取法“經世文編”的架構進行類目的安置。張謇1901年為鴻寶書局石印《中外政治策論彙編》作序時，特別提到讀此書的感受，該書“由治道學術以迄海邦，共十六門，大致與魏氏源之《經世文編》相近，皆《文獻通考》之支流，而取法於《周官》之區分門類者也。”⁷³1902年刊印之《中西經濟策論通考》，也提到，“策論之最切於時務而見可於經濟才者”。“漢有董子賢良三策，賈生陳政事一疏，宋則蘇氏一門父子兄弟三人均有策略傳世尚也。近如歷代名臣奏議皇朝經世文編，詢洋洋乎大觀也。”⁷⁴這些表述，自有其深意在，說明“經世文編”的影響所在。不單是“經世文編”，中國傳統的類書目錄，也多所採用。光緒二十三年（1897）點石齋印《時務通考》，即是秉承《文獻通考》之意圖，接續《皇朝通考》而來。其《序》曰：“馬貴與著《文獻通考》，自秦漢至唐宋典章經指，粲然可觀。我朝乾隆時奉敕續之，又有《皇朝通考》之刻，政書於是大備。孟子言治曰法前王，荀子言治曰法後王，孔子則曰今用之吾從周。然則前王后王之典章經制折中於我朝，則《皇朝通考》一書尤重。”⁷⁵同年錢頤仙選輯《萬國分類時務大成》，“門類大綱細目共得四十卷，分列一百八十餘條。”重要的是，“是編其間事實，雖專採取泰西各國書籍，為近日講求時務急需，然體裁則取法我中華藝林典則各種分類舊章。故目錄仍以天文地理列諸開卷之前，次則邦國、國君、官職、選舉、政治、商務，一一彙編，有條不紊。蓋天文地理為千古治法之大本大原，未可忽忽也。”⁷⁶1902年出版之《西學三通》，分為“西政通典”、“西史通志”與“西藝通考”，單就此即可看出對傳統的繼承。⁷⁷

如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序例》中所說的，“西學各書，分類最難。凡一切政皆出於學，則政與學不能分。非通群學不能成一學，非合庶政不能舉一政，則某學某政之各門，不能分。今取便學者，強為區別。”還對照中國分類表示，“顧自七略七錄以至四庫總目，其門類之分合，歸部之異同，通人猶或訾之，訴訟至今，未有善法。此事

73 署“光緒辛丑小春月南通州張謇序”，見鴻寶齋主人編，《中外政治策論彙編》，上海：鴻寶書局石印，光緒辛丑[1901]，頁1-2。

74 秦榮光輯，《中西經濟策論通考》，內頁署“華亭姚肇瀛松泉甫選定，上海秦榮光月汀甫參訂，雲間郭曜五峰甫校字”，序文署“光緒壬寅孟春慈溪陳邦瑞瑤圃氏謚序”，“光緒壬寅仲春華亭姚肇瀛松泉氏序”，“光緒壬寅仲春上海秦榮光月汀氏自序”，深柳讀書堂，光緒壬寅[1902]，頁1-3。

75 《時務通考》，點石齋，光緒二十三年[1897]。該書共分31門：天算、地輿、公法、約章、使臣、稅則、錢幣、禮制、兵政、律例、工政、鐵路、礦務、電報、郵政、農桑、商務、教務、學校、官制、議院、史學、算學、化學、重學、汽學、聲學、光學、測繪、醫學。

76 錢頤仙選輯，《萬國分類時務大成》，光緒二十三年[1897]，袖海山房石印，頁1。所分卷次為：卷一，天文類上，卷二，天文類下，卷三，地理類上，卷四，地理類中，卷五，地理類下，卷六，邦國類上，卷七，邦國類下，卷八，國君類，卷九，官制類，卷十，官職類，卷十一，選舉類，卷十二，政治類上，卷十三，政治類中，卷十四，政治類下，卷十五，商務類，卷十六，公法類上，卷十七，公法類下，卷十八，會盟類，卷十九，邦交類，卷二十，文學類上，卷二十一，文學類中，卷二十二，文學類下，卷二十三，武備類一，卷二十四，武備類二，卷二十五，武備類三，卷二十六，武備類四，卷二十七，礦務類，卷二十八，農政類，卷二十九，製造類上，卷三十，製造類中，卷三十一，製造類下，卷三十二，人事類上，卷三十三，人事類下，卷三十四，人材類，卷三十五，人物類，卷三十六，西教類，卷三十七，宮室類，卷三十八，器具類，卷三十九，動物類，卷四十，植物類。

77 袁宗濂、晏志清輯，《西學三通》，署“光緒壬寅夏月萃新書館精本”，上海文盛堂印。

之難久矣。”⁷⁸發生在梁啟超身上的例證，映射出那個年代試圖對西學進行分類所遭遇的種種困難。1899年徐維則輯成《東西學書錄》，單是分類就生髮這樣的疑問，“自七略以下，門類分合，部居異同，前人猶多訾議。東西學書，分類更難。言政之書，皆出於學；言學之書，皆關乎政。政學難分，則部次奚定？今強為區別，取便購讀。通人之誥，知難免焉。”⁷⁹分類難引發的直接後果是，稍後所出的彙編資料，所分類目越來越細。

我們知道，晚清與西學傳播密切相關的一幕是西學轉化為新學，中西之爭也轉化為新舊之爭，“西學本身也跨越中西認同的緊張，獲得了一個更具普世性的名稱——新學。”⁸⁰各種新學叢書替代各種西學書籍的出版，頗能說明問題。這其中既有以“皇朝”命名的《皇朝新學類纂》，也有主要取法日本的《新學大叢書》，顯示在19、20世紀之交日本漸成中國攝取新知的國度。發生的變化還不只是名稱上的，重要的還在於所收類目愈發擴展，實難以不同學科來安排，往往以“類”來加以區分。內中所顯示的各類目，也表明在各分科越來越多的情形下，以往安置學科的方式也面臨種種困難。

《皇朝新學類纂》出版於1901年，計分十類：天文、地學、道學類、政學類、文學類、武學類、農學類、工學類、商學類、雜學類。號稱“凡有關於世事而為今日之急務者，無不刪繁而節取之，厘然井狀，有條不紊”。而且，“是書之出雖無補於經濟之學，而有志揣摩者未必不因是書裨益也。”⁸¹這還不算什麼，1903年出版的《新學大叢書》，總挈十大綱，列目七十二，更令人歎為觀止。俞樾在《序》中對比《富強叢書》、《時務通考》之類，對該書讚譽有加：“今觀乎《新學大叢書》，不禁感慨系之，披覽之餘，覺宏篇巨制。總挈十大綱，列分七十二，眾美華臻，綱舉目張，有條不紊。凡關於家國政事者，無不逐節具備，亦可見矢志揣摩之苦心。有志新學者，得此以擴求之，庶能以修身立品之基，擴為富國強兵之策，蔚為國家有用之人才。”⁸²所謂“十綱”，具體包括有政法、理財、兵事、文學、哲學、格致、教育、商業、農學、工藝。具體分類如下：

政法：政治、法律、君主、政府、議會、地方自治、交涉公法、主權。

理財：經濟、生計、財政、歲計、貨幣、商約、稅則。

兵學：兵學總論、條教、戰術、陣法、操法、馬術、工程、學校、兵器。

文學：學術、歷史、地理、辭學、語學。

哲學：哲學總論、宗教、神理原理學、心理學、論理學、實質學、倫理學。

78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頁122-26。

79 徐維則所輯《東西學書錄》，後由顧燮光補，改名《增版東西學書錄》。見徐維則輯，顧燮光補：《增版東西學書錄》，1902年，第1-15頁。

80 羅志田：《傳教士與近代中西文化競爭》，《歷史研究》1996年第6期。可以補充的是，耶穌會士所介紹的新知，究竟當稱為“西學”還是“新學”，在當時就曾引發爭議，富於意味的是，“耶穌會傳教士可以把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堅持說是‘西學’，但中國人卻清楚地認識到，那首先是一種‘新學’。”參見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4卷“天學”，第2分冊，第671-74頁。

81 吳宗珩：《序》，廣益書屋主人編《皇朝新學類纂》，上海廣益書室印，1901年，第1頁。

82 明夷編：《新學大叢書》，上海積山齋記書局，1903年石印，“序”，“例言”。

格致：格致總論、數學、天文、氣象學、物理、化學、植物、動物、礦物、地質學、生物、生理。

教育：教育論、教育史、學制、中國現今學制、教員、教授法、管理術、學校衛生、家庭教育、女子教育。

商業：商業經濟、商業地志、商學、權度。

農學：農業經濟、農業理化、農會、種植、畜牧、蠶學。

工藝：工政、工律、工學、土木工、煉冶、化電工、製造、美術。

此亦可看出，十綱之目已難以用學科加以涵蓋，相應的，按照不同學科來彙編西學已是困難重重。這也代表著西學彙編資料新的趨向，那就是不再局限于西學分科觀念，而是按照相應的類目進行整理。

晚清所出版的各種西學彙編資料，不是這裡盡可討論的。可以明確的是，這些資料的編輯，其初衷正是為了提供按照學科規劃之“西學門徑”，因此也構成檢討晚清取捨西學的重要資源。這其中以西學分科安排各種與“學”密切相關的資源，已是無可辯駁。在諸多學科中，晚清是如何選擇與定位的，以及按照怎樣的原則進行選擇，這些文獻也足可作為重要的參照。綜觀晚清所出版的眾多西學彙編資料，其所顯示的基本特徵是針對西學所做的取捨，這可說是貫穿始終的主題。當時所出版的諸多西學彙編資料，均不同程度顯示了這一點。用不著特別指明，這些彙編資料的編輯均系本著一定的立場與認知進行這項工作的，由於認知有異，取法的重點各不相同，因此這些西學彙編資料本沒有按照清晰的分科來進行類目的安置，這樣也為依據此進行統計量化的分析造成了諸多困難。在這個意義上說，按照當下對於學科的認知總結此前的西書中譯，有其合理性，甚至可以說，不採取這樣的方式，很難描繪出西學東漸的歷程及圖景。

然而，由此也要看出，依託晚清西學彙編資料總結“西學東漸”的歷程，尤其是檢討各學科的成長所遇到的諸多困難。首先是這些資料儘管是按照一定的類目進行編輯，但這些類目並非完全按照嚴格的學科觀念進行分類，其次是即使用到了延續至今的學科分類觀念，也同樣有需要面對的問題，內中所安置的是否符合具體的學科，也須另當別論。當然這些西學彙編資料自有其意義所在，那就是其中所顯示的是學科意識逐步成長的過程。它展現了晚清士人在分科觀念影響下，對西學的接納頗為關注學科之次第，並著力于辨析“西學門徑”。值得強調的是，西學彙編資料的出現，本身是因應時代的認知，是對“西學東漸”歷程再選擇的產物，是二度創造的產物。因此，需守望具體的年代進行考察，以此檢討晚清的“西學東漸”。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在一篇文字中曾提醒注意區分某一觀念或辭彙在中西思想脈絡中不同的意義。他形容說，“自由”或“民主”等意義籠統的詞，很像放了許多不同東西的箱子，西方人與中國人在這個箱子裡面所放的東西不一定完全一樣。要知道兩者的異同，非得開箱取物，再將裡面的東西分門別類不可。缺少這種“開箱”（unpacking）功夫，我們無法得知中

國知識份子的“自由”或“民主”等觀念，是他們“接受的西方觀念”，還是將固有理想投射到西方觀念之上的結果。⁸³誠哉斯言。對於晚清西學彙編資料，或也需要這樣的“開箱”功夫，透過其類目，看看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晚清所理解的學科究竟是怎麼回事，如此，秉承“歷史的維度”審視中國現代學科的成長，也才有可能。

83 墨子刻：《序》，見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8年，第v頁。